

中国开放政策的前景及其世界影响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SPECTS & IMPLICATION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中国进入世界 世界历史的新章

历史的回顾

自从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思想家们一直在设想，有朝一日，中国与西方平等合作时，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很少与西方接触，偶有来往，中国亦是加以限制。之后，从十九世纪中叶至1949年，西方各国，仗恃其军事实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自1949至七十年代，中国与西方（包括日本，下同）很少建设性的交往，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基本上隔绝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在西方是大酝酿、大创造、大发展的年代，当时中国的孤立损害了中国，也使得世界失去了中国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本来会作出的贡献。

自从尼克松和毛泽东1972年2月握手言和以后，尤其是自从邓小平宣布中国的开放政策以来，西方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正在进入国际安全、经济、科学和文化各个领域，其速度远超过了大多数观察家十年前的预料。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所期待的新时代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正在和西方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其结果，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

开放政策能持续多久？

自然，很多西方人士怀疑中国的开放政策和迅速发展能否持久？历史上不断爆发的排外主义、反知识

化、以及沙文主义，长期以来，妨碍了中国所寻求的安定和发展，他们回忆起义和团运动，反传教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因而担心类似事件的重演。怀疑论者担心，与开放政策相继而来的腐败作风和蔓延的道德败坏，将会产生强烈的反对力量。庞大的人口负担、教育落后、保持农业持久发展的困难、能源、交通、运输、通讯薄弱，怀疑论者担心，即使是最明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能克服这些严重障碍而获得经济的持久发展？他们对外部世界能否长期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亦无定见。他们担心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农业经营个体化、利改税、放松对文化的控制——会产生将来难以控制的社会力量。例如，他们想知道，中国人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速度，是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中国是否会出现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问题？怀疑者还认为，在改革中丧失了特权的官僚机构和单位正在待机还击。总之，他们怀疑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否持续到现任领导人身后。

近几年的发展

如果以上的疑虑能得到解决，那么，就有理由对中国的改革抱审慎的乐观。

有不少事实说明中国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是可能持久的。78年以来的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过去富足很多，创造了一个有利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在做出决定要迅速而稳妥地发展中国经济时，大体上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中国问题专家，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78—1980年中美复交期间，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和印度事务。

意见一致，他们的政治争论只是在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这种争论比较1959—1976年最高领导层中的斗争，有本质的不同。那时的分歧是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此外，文化大革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上了重要的一课，使他们懂得了排外主义、闭关锁国和无政府主义的昂贵代价。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再搞这一套。而且，1949年以后那种闭关锁国和反知识分子的做法，不仅有其社会背景，更由于个别国家领导人错用了其绝对权威。很难证明，将来在中国，还会出现这种权威。最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肯定了胡耀邦、赵紫阳及其同事们坚持改革、以审慎的方式清除障碍以取得经济更快发展的决心。

这些乐观的理由，尽管有根据，但毕竟是有争议的。领导层的团结一致，可能在邓之后出现变化；而众所周知，中国人适应政治风向变化的能力是惊人的。例如，毛时代的某些笔杆子得势时，也曾不乏人拥护的。

历史趋势的继续

真正令人信服的理由，与其说在于这几年的发展，不如说在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深刻趋势。不应当把1978年以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偶然事件。它实际上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一个深刻的、长期的历史趋势的继续和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从三十年代以后，被一系列的不幸事件无情地打断了。这些事件包括1931—1945年的日本侵略、1945—1949年的国内战争、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延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重演的，是由特殊的和不幸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现在中国正在继承本世纪初开始形成的在二、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继续的某种发展趋势。

为战争和内乱所中断的正常发展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被中断了的是什么样的发展呢？首先是具有世界才干的知识界崭露头角。中国，尤其是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的艺术、文学、科学、医学以及人文的学者们开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其次是改革的兴起。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早期在中国出现了现代婚姻法、民法、刑法及商法。活跃的新闻界、良好的大学以及议论土地改革。——尽管对于一个极端贫穷、政治上受压迫、组织上软弱无能的国家的实际情形来说，这只是凤毛麟角。但是新事物之萌芽确实冒出地面并成长起来。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及其郊区农村已经开始进入世界经济。那时东北的长春至大连的工业地带显然与日本有密切联系，而华北平原的北京——天津地区、长江下游的南京——上海地区以及南方的广州与日本、西欧以及美国都有广泛的商业

联系。这些沿海城市也把内陆城市如武汉、西安以及重庆带进了现代世界。应该记得尽管有过不公正和深重的苦难，上海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是世界大都市之一，是东亚最大的城市。

这些就是四十年来的内战、革命及激烈的权力斗争所破坏了的正常的发展趋势。毛之后的时代正在进行的正是重新恢复这些发展。要是没有发生战争和国内的动乱，那么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以及东北的城市也早就享有了香港、新加坡以及台北今天的繁荣。战争和内乱使中国的沿海城市失去了有利的机遇。事实上，香港台北等城市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上海、天津和广州的小部分资本和企业家的管理才干与国际见识在革命年代流入这些城市所造成的。

今日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国际环境

此外，正如托玛斯·劳斯基（Thomas Rawsky）在他即将出版的关于现代中国经济的重要论文中所指出的，除了上述政治动乱时期外，中国经济一直以相当稳定的速度发展了近80年。密执安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敦伯格（Robert Dernberger）估计这一发展速度自本世纪初以来在政治安定时期大约为每年7%。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伯金斯（Dwight Perkins）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势头和潜力。

因此，中国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有其固有的根底。而现近经济发展的方式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趋势的延续。另一方面，今天中国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比本世纪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中国现在政治上统一，她加入世界大家庭备受欢迎。而在从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日本认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中国的出现将威胁它的根本利益，美国和西欧各国是以极其矛盾的心理来对待这种可能性的。而今天，除苏联外的所有国家都相信，一个强大、安定、现代化的中国能够为保持地区和世界的平衡作出贡献。

东南亚和东亚是最有生气的经济区

此外，有一股强大的地区推动力支持中国执行开放政策。当今世界最有生气的经济区是东亚和东南亚。在分析经济发展时，有时候，不从“国家”发展，而从“城市”中心及其郊区农村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许有益。在这种意义上，过去二十年中在现代国际经济中迅速兴起了几个东亚和东南亚城市中心及其郊区农村：东京、大阪、北九州、汉城、台北、高雄、香港、马尼拉、曼谷以及新加坡。这些城市，通过商业与北美和欧洲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地区，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这些大城市地区及其邻近农村日益分享着超越国界的共同文化。

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的经济共同体。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可能率先成为太平洋经济区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中国同时如此。自然，它们将是本世纪初走在最前面的那些地区：东北走廊、北京——天津及华北平原、上海——南京及长江下游地带，以及广州——香港连成的巨大都市区。或许还应加上：福建省的厦门和福州，这两个城市对台湾的经济联系会继续扩展，并最终成为合法；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江上游的重庆以及西北的西安。接着，这些城市将促进各该地区内的与之贸易的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不是说所有十亿中国人作为从事世界经济的现代人迅速进入世界。而是说，更确切些，大概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一代或者稍长的时间内，上述城市地区内，大概有三亿至五亿的现代化中国人进入世界经济社会。

因此，从现在起的一代时期（约30年）内，大多数中国人，即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大概仍将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尽管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可能比预料的要快。但是，相当多的城市居民将享有丰富的物质，具有熟练的技术，可以超越地理界线，参与世界之文化和政治潮流中。对整个世界来说，中国致力于现代化的历史意义变得明朗了。即使到了2010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达到了相当今天工业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工业生产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有象今天生活在美国和西欧那么多的“现代人”——随之而来的创造力和污染。当人们回忆起过去25年日本、南朝鲜、台湾以及香港进入世界大家庭所产生的影响时，就会认识到中国进入世界的含义，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会是令人震惊的。

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中国进入世界，谁也阻挡不了

美国没有遏制这一发展的能力。尽管限制资本和技术流入中国的协同努力将会对其发展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反对中国现代化的做法会招致敌对。况且，从1950年至1972年，美国奉行的旨在使中国停留在贫穷、软弱的状态，在国际事务中处于孤立无援的政策，已经以失败告终。因此，我认为应当把中国的兴起看作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良机之一——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持久的、稳定的、有益的关系之良机，而不应把它看作与美国利益相敌对。中国成功地进入现有的国际安全、经济、科学及文化体系将成为和平的一个主要保证。

中国将仍是独特的中国

迄今为止，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两个关于毛以后的中国问题：改革是否可能坚持下去？中国是否在放弃社会主义而成为资本主义？（我们尽可放心，中国将依然是独特的中国，它的体制将反映中国特有的文化、革命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依我看现在应该是开始集中探讨一些新问题的的时候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正在迅速向纵深发展着，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并探讨如何处理这一发展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相当紧迫，因为过去的五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振兴可能比一般人五年至十年前所预测的要快。

内部的差距与不平衡

中国与西方的结合是一个艰巨的工作过程。在中国内部，领导人将面临发达繁荣地区与落后贫困地区之间的社会紧张关系。这两个“中国”之间的差距很可能扩大。中央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分配财富，将一些投资拨给较不发达的地区。此外，如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表明，分散的抗议、百姓骚乱，甚至偶而的暴力行动都有可能发生。产生这些事件的肇因，虽然有时是在青年、农民和军队中，但从来就是难以预料的。在这种时刻，重要的一点是领导人不惊慌失措、不反应过激。

从国际与区域和平看中美关系的基础

美国和中国在七十年代的逐步接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付苏联扩张主义对两国的威胁。这个基本事实现在依然存在，但是稳定的关系不能仅仅建立在这上面。进而言之，美国和中国都不想长期与莫斯科敌对，北京和华盛顿都愿意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当然不能牺牲中美关系。总之，北京和华盛顿都谋求一种不仅仅是为了对付苏联扩张主义而发展的中美关系。

不过，安全问题必定是每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中心。单单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不足以维持任何双边或多边的关系。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求这些交流与合作是有益而不是有害于他们国家的安全。因此，中国、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必然提出这个问题：如

*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夏隆向美国法庭控告美国时代杂志以诽谤罪，时代杂志因而受审，法庭五人陪审团裁定诽谤，但非恶意。

果反对苏联在亚洲的野心的共同利益没有提供扩大中国与西方（包括日本）之间联系的持久的战略基础，那么，中国的加入国际社会对中国和西方有什么利益呢？这些利益如何得以增进呢？

在我看来，答案必须在区域里找。即是说，中国进入太平洋国家的区域能够对该区域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作出有益的贡献。有四个地区：朝鲜、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南亚。目前中国在这四个地区的作用是众所周知、对稳定局势有利，这里不详述。

国际社会中立和主权的观念，已经改变

在国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强调，他们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并将抵抗任何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凡中国领导人认为是侵犯其国家主权的问题便立即会情绪激昂、争论不已。这种敏感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主权在一个多世纪里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犯。中国领导人开始执政时就许诺要使中国摆脱屈辱。既然香港在1997年将归还中国，那么只有台湾是唯一要收复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世界已经前进了。国际事务已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对独立和主权的要求显得难以理解。今天，独立和主权的观念，已经为相互依赖和渗透所取代，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无法完全控制美国货币（美金）价值，美国的经济大量依赖外国的能源时，当美国的报纸可以被外国领导人控以诽谤罪在美国法庭受审*，美国国会受制于外国的院外游说活动集团；美国难以保护其国家机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享有主权了吗？当美国忙于一系列重要的盟国事务，冒着核战争的危险与苏联对抗时，美国没有奉行完全独立的外交政策。其外交政策的实施必须既考虑到盟国的利益，甚至也要考虑到敌手的利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形也如此。

开放与主权

如今，中国正在修改其法制以吸引外资，调整其经济政策和作出决定的程序并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报导统计数字，在权力机构中进行重大改革以促进外贸和技术转让。这些变化会加强中国的安全，促进经济增长，但不会加强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这种改革造成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并导致国家无法控制的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中国没有依附于任何大国，但正在将其一定的自主权出让给国际体系，然而自身也在其中发挥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在其公开讲话中还没有提到过上述的变化。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对世界趋势的分析中还没有见到过。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暗示他们深刻意识到这一现实。外部世界必须认识到许多中国人对进入世界有矛盾心理并对

此有所觉察。在发生有关主权和独立的合法问题时，例如关于台湾问题，必须特别注意尊重中国人的观点。同时，中国人将主权的概念扩大至包括西方认为涉及互相依赖的问题，诸如核安全，商业惯例和法律的性质。一个具体例子就是中国不愿停止利用核废料以满足国际间对核扩散和预防核事故的关注。中国人不愿进入外国法庭去捍卫自己利益，声称外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利益。而且他们想使中国成为中国商人与西方商人之间商业争执的仲裁者。中国在起草保护外国投资、版权和专利的法规或签订这类协定时遇到的困难也是同主权这个问题有关的。这些问题在六十年代，台湾实行开放和进入国际经济时都曾发生过。需要有相当长的持久性、相当大的耐心，还要费相当多的口舌。为了缩小中国与西方在主权概念上的分歧，需要长期的、持久不渝的解释和耐心。

如何顺利进入国际经济体系

在经济领域里，中国纳入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也存在一系列课题。中国希望吸引外国投资以加速其发展速度，迅速扩大其出口以偿付向国外进口的款项。中国正寻求优惠利率的贷款。但中国政府对其预期的资金需要或出口增长率却没有提出任何计划。在同其竞争者类似的增长率比较，这种增长率是否实际？

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我想中国必将加入后两个组织），对于这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是一个主要事例。中国会不会遵守这些组织的规章？会不会对其他成员尊重的规则实行弃权？会不会要求改变这些组织的工作方式？中国会不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这些组织分配的有限资金？抑或中国之成为成员国后会不会使这些组织的资金大幅度增加？迄今为止，中国进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情况非常好，但好景会长久吗？

其他一些复杂的经济问题即将出现。在贸易方面，随着中国建造规模巨大的工厂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了出口这些工厂的产品需要确定其生产成本才能弄清中国是否在倾销商品？比如说，中国正在建造年产三百万至五百万辆的自行车厂和年产二百万至三百万台的电视机厂，他们希望其中的一小部分产品（大约百分之十）将出口。那么，这部分产品在整个生产中的成本将如何计算？

为了加快中国顺利地进入国际经济体系，有必要在各级——在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在中国与各政府之间，在中国与西欧、日本和美国的私营企业之间——进行比迄今为止已经进行的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有必要在更大程度阐明中国的意图。否则，中国可能遇到日益增长的阻挠，那些害怕中国的振兴会带来潜在性破坏后果的国家会采取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措施。

057911

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交流，所提供的裨益和所需解决的复杂问题比其他任何方面都要多。至今，这种交流已证明是中国鼓励实行对外开放的强有力的促进因素。确实，1978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流如何可以帮助外交政策。

访问学者和留学生

与中国进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交流规模比通常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技术转让目下正在进行中。中国有二万二千多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正在国外学习，其中有一半在美国各大学学习。由于中国的研究院课程有限，大约有一半正在攻读高级学位的中国人是在国外学习。有四千多名在美国学习或进修过的中国人已返国。

至于说到在中国的美国人、美国新闻署、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和教育部所资助的项目是美国政府在国外进行的最大项目之一。在中国的富尔布赖特（Fulbright）计划，就经费而言，超过向任何其他国家提供的预算。在民间领域里，七十五所以上的高等院校已同中国相应的高等院校达成协议，美国在中国已有25个以上国外研究项目。在历史上，在中国从事长期研究的美国人数总是很有限的——可能不到一百。但从1979年以来，根据中国的估计，已有几千名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通过各种交流计划直接进入中国社会。尤其通过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计划，每年派遣五十名学者去中国进行长期研究。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正在培养中，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更确切、更实际、更敏锐。

派遣留学生和学者只是技术转让的渠道之一，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公司的渠道。几乎西方各国政府都与中国达成正式的科学交流协定，尽管这些计划的生命力差别甚大。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公司已邀请成千上万中国技术人员，作为销售合同的一部分或为了发展友好关系，到其工厂或实验室接受培训。各公司也在中国举行讨论会、举办展览会和培训班。自70年代末以来，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院举办讲座。无法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逗留时间及——最重要的是——效果。但花费的努力是相当大的。

高级技术的合作研究

据一项估计，美国售给中国的高级技术现在每年超过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过去是禁运的。根据两国

政府间的正式科技协议，现在两国政府机构间有22个议定书，涉及农业、宇航技术、大气科学技术直至医学和核安全技术。对这些议定书的成果进行过仔细审查的人得出结论说，这些议定书对两国均非常有益。

——中国采用了美国测震仪器在全国监视地震，尤其在多震区。两国都在记录和估价测得的数据。

——两国间正在交换种子以丰富主要作物的遗传库。例如在密执安州，由于从中国东北引入了新的种系，那里的大豆抗寒性提高了。

——两国联合研究组研究了中国长住一地人口癌症发病率的地理因素（中国人口迁移率低，提供了研究的有利条件），并正在研究环境变化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美国人还在研究中国的药典以寻找新药。

总之，在科学方面，在两国的交流中，不仅中国，而且美国均有裨益。尽管迄今为止给予多于收获，但这种交流在商业和科学领域已得到近期的好处。从长远来说，我们正在帮助中国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可能还有未来的决策者。这对美国有着深刻和有利的影响。

目前，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正在制定一项新的特别有希望的交流计划。这一创举将使美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直接与中国各部和各企业的同行接触，以便增强中国作出合适的技术进口决定的能力和提高中国有效地吸取外国技术的能力。

科技交流成功的原因

有几条支配美国人行动的原则有助于说明美国为什么成功，包括动员很微妙的国内政治上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重视。前后两任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布雷斯和乔治·凯沃思）先后提请白宫注意与中国的科学交流的重要性，使得它得到连续不断的关注，因而有今天的成就。美中两国已成立一个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以检查问题和前景以及确定新的活动项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闻署两任主任——约翰·雷恩哈特和查尔斯·威克——重视资助与中国的交流。两国交流计划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为此花了钱。

——美国出于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真诚的尊重而与中国打交道。这种精神，美国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是没有的。美国持有一种长远的目标，即中国顺利地进入国际社会对美国是有益的。美国设法避免了家长式的姿态，不想进行“援助”。美国曾谋求鼓励中国人承担科学交流费用的合理部分并要求一定程度的互惠，在这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总之，美国试图留意并尽可能发展和保护本身的利益。

——两国的交流是按初步的计划进行的。那就是

说,科学交流是在开发性的战略指导下进行的,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都遵照这一战略行事。每一领域的科学交流开始时都是短期的互访(人们戏称之为“学术商业旅游”)。在互访中,双方同一科学领域的负责人开始互相认识并了解对方国家这一专业的现状。下一步通常是开会。在会议中开始产生一种专业上的共同承诺感。接着是美国人到中国讲学和中国高级科技人员到美国作研究工作和短期进修。这一过程现在到达最后一步:合作研究——美国人在中国进行研究、中国人在美国接受研究生培训。忽视这一程序就会产生问题,如同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流中发生的问题。发展交流规划的另一目的是增进双方的信心,缓慢地但坚持不懈地从不太敏感的科学合作的领域向比较敏感的领域发展。其目的,当然,是在双方可以理解的、合法的国家安全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合作。这个规划的最后一步是使交流计划制度化,从而其连续性不是依靠少数人的善意。签署正式协议,并把交流计划植根于美中两国政府机构、研究院和大学中,这就有希望将交流与中美关系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变化分隔开来。

——在交流中已充满了现实感。美国一直设法提醒自己,中国在没有美国科学的情况下存在四千年了,而对于中国的生存来说,美国仍将既不是不可缺少也不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大多数领域里,美国的科学才智并非唯我独尊,日本人和西欧人愿意,实际上渴望向中国供应技术。与此同时,不与中国交流,美国也能过得很好。在同中国的短时期交流中,美国知识界在近期内只得到很有限的提高。中国不是缺美国不可,美国也不是缺不了中国。但两国互相合作可使双方日子过得更好一些。谁更需要谁的问题不是问题所在。现在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流基础。

——最后,两国在交流过程中很注意政治情势。过去十年情势对扩大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很有利,但情况不一定总是如此。中美关系中仍有一种固有的脆弱性,台湾问题随时可能来干扰。美国认识到这种复杂的背景,一直设法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尽速加以推进。就象骑双人自行车:除非两人一起蹬并保持足够的前进势头,否则就有可能摇晃。

有待解决的问题

的确,两国的交流正遇到许多恼人的问题。中国政府未为其留学生提供足够的资助,指望东道国或大学为交流提供大部分经费。现在正在进行的一项详细调查将查明美国大学、基金会、政府和私人自1979年以来为在美国培训中国人花费的总数,这项调查还将表明这笔钱数是很可观的:美国大学从1979年到1983年为正式资助的中国留学生花去了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政府为此所花的钱数。同时,由于两种社会的差异,美国人在中国从事研究受到的限制比

中国人在美国受到的限制要严格得多。问题很复杂,但交流仍在取得进展,不过大有改进的余地。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人集中在几个专业。中国人集中选修工程和科学专业。某些与国防有关的高级技术似乎成了明确的目标:遥感,激光技术,航空航天工程等等。中国政府很少为人文科学的学生提供资助。商业管理、法律和经济学其实是中国改革的重点,但这方面的课程大部分由美国资助。有些美国分析家说,中国留学生集中在比较高、尖的与军事有关的专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还指出,中国正在与高级技术公司和贸易公司建立关系。重要的是要仔细注意这些事情,弄清中国的意图。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是否能吸收他们正在获得的技术。在国外进修过的人员回国后是否得到重用?能发挥所长,抑或被认为可疑,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价值观念?他们是否在美国得到合适的培训?中国和美国都在为培训中国人才而投资,但双方极少在比较高层的会议上讨论这些及有关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吸收技术并从现在他们能得到的众多技术中选择合适技术的能力。中国人通常喜欢最新技术和最现代的设备,而西方推销员常常十分乐意刺激中国人的胃口。但在购买时往往没有考虑到这些设备的专门用途,也没有考虑维修这些设备所必要的基本条件——气候的控制,水电供应,维修人员等等。

科学问题超越国界

不能忽视在广泛的科学交流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应当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两国负责人进行真诚坦率的讨论。但不能因此掩盖了我们必须发展交流的理由。就像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布雷斯在1978年7月访问中国时所说的,“各国科学界的合作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是超越国界的。”为了解决诸如消灭传染病,环境保护,合理利用海洋,生产足够的粮食、纤维和能源的短缺问题,使所有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有必要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此外,随着核技术和裂变材料的扩散,要是人类中的大部分不能分享科学进步而仍然陷于贫穷与疾病中的话,那部分人可能最终会毁掉我们大家。合作研究,广泛的国际交流和边缘技术的联合项目会有助于将各国影响的科研机构联系起来,减少误会和怀疑。固然,光是学术合作不能缓和战略利益的根本冲突。但是至少,任何国家的知识界——包括美国的在内——如果脱离了全世界的知识潮流,是不可能兴旺的。凡是能够让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主导其国际活动的国家必能确保其创造力。中国进入世界科学和人文学界(Scientific & humanistic community)对于这一长远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陈思明 陈向荣译)